

# 结构主义语言学产生的历史逻辑

鲍 贵

(南京工业大学, 南京 210009)

**提 要:** 结构主义是语言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 20 世纪源于语言学的重要人类精神财富之一。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 西方思想史上出现了一场反对不同学科研究中普遍存在的“实证主义”倾向的运动。在这一大背景下, 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形成有多种促成因素, 主要包括历史语言学面临的问题、索绪尔和库尔特内及其学派的先期研究以及布拉格学派的成立等。

**关键词:** 结构主义语言学; 索绪尔; 库尔特内; 布拉格学派

**中图分类号:** B08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100(2007)04-0022-5

## The Rise of Structural Linguistics

Bao Gui

(Nanj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Nanjing 210009, China)

Structural linguistics is part of a broad movement in the history of Western thought that began towards the end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twentieth to reject the “positivism” prevalent in different sciences. Its rise is attributable to multiple factors, among which are mostly challenges to the then historical linguistics, the early work of Saussure, Courtenay and their schools, and the founding of the Prague School.

**Key words** structural linguistics; Saussure; Courtenay; the Prague School

结构主义语言学既是 20 世纪最重要的语言学学说, 又是重要的语言哲学理论。由此生发的结构主义几乎影响了该世纪的所有学科。它不仅改变了语言学内部研究的范式, 而且它所提出的一些原则和方法同样适合于其他科学, 并且引发了法国结构主义思潮。语言学中的结构主义“反映了思维的总的趋势, 这种趋势近几十年间在不同程度上几乎出现于科学的一切领域”(兹维金采夫 1981: 111)。因此, 结构主义不仅是一种研究方法, 而且是一种世界观。它认为世界由各种关系构成而不是各个要素的简单相加, 反对孤立地研究某种现象, 主张从整体上研究现象之间的关系。这一世界观较早地体现在语言学家索绪尔(Saussure)的语言系统或关系学说之中, 尽管他在《普通语言学教程》(1985)中从未使用“结构”(structure)或“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等术语。索绪尔因此被誉为结构主义语言学的鼻祖, 但是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诞生却是索绪尔逝世十多年后的事情。首次系统论述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学派是

1926年由马泰休斯(Mathesius)和雅柯布森(Jakobson)等语言学家成立的布拉格语言学学会, 即布拉格学派(the Prague School)。1928年, 布拉格学派的成员与日内瓦学者在海牙举行的第一届国际语言学家大会上起草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章程。1929年, 第一届国际斯拉夫学者代表大会在布拉格举行, 布拉格学派提交了《论纲》, 全面阐述本学派的理论和方法论原则。也就在这一年, 雅柯布森首次使用“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一词。由此, 结构主义语言学正式诞生。

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诞生不仅离不开包括索绪尔在内的一批语言学家的努力, 而且离不开当时诸学科发展的背景。学术界对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产生虽有论述, 但是研究缺乏系统性, 对结构主义语言学诞生的历史逻辑勾勒得过于简单, 不够清晰。本文从 4 个方面阐述结构主义语言学产生的历史过程: 当时的语言学研究所借鉴的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嬗变; 格式塔思想的影响; 历史语言学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衔接; 布拉格学派对结构主

义思想的系统阐发。

### 1 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嬗变及其影响

19世纪的诸多语言学家努力使语言学成为一门科学,将语言学同当时发展比较成熟的自然科学相联系。“如果语言学是一门自然科学,那么‘语言’就必然是同自然界的其他构件一样能够被客观描述的某种实体”(Sampson 1980: 17)。对历史语言学研究影响较大的是生物学和古典物理学,尤其是机械物理学。达尔文生物学理论的影响最明显地体现在施莱歇尔(Schleicher)的思想中。施莱歇尔将生物学视为典范,视语言为有机体。他利用植物学对物种的分类方法确立印欧系语言之间的亲缘关系,为印欧系语言的关系建立了著名的“谱系树”(the genealogical model)。在机械物理学中,一切现象都能根据简单的、力和运动的决定论法则来描述。借鉴物理学成果,语文学家希望根据适用实例的一整套普遍法则去描述某一语言中语音变化的历史。(Sampson 1980: 15)格里木系统地确定了希腊语、峨特语和高地德语之间的语音对应关系,即“格里木定律”(Grimm's law)。虽然这些规律因为出现了一些例外而遭受批评,但是格里木明确提出语言演变的规律性,确立历史语言学的严谨性。后来,维尔纳(Verner)补充解释“格里木定律”难以解释的一组例外。葆朴(Bopp)根据与不同音节的相对“权重”(weight)相关的“重力定律”(law of gravity)机械地解释印欧语言中的元音交替现象(Sampson 1980: 16)。格里木和葆朴允许语音规则有例外,包括维尔纳在内的新语法学派则坚持语音规则无例外。奥斯特霍夫(Osthoff)和博鲁格曼(Bugmann)对新语法学派的理论本质作了以下概括:一切语音变化都是机械过程,依照不容例外的法则发生(Robins 2001: 207)。古典物理学家相信,要发现运动的一般规律,就必须从对“质点”(material point)的研究出发。从整体上看,历史语言学研究以词为单位,注重语言中的细微事实,与当时的物理学研究方法一致。从认识论着眼,生物学和物理学都受到由孔德(Comte)引发的实证主义的影响。实证科学的本质就是把一切现象看成服从一些不变的自然规律,其目标就是发现这些规律,并把它们的数目压缩到最低限度(孔德 1993: 25)。丹麦结构主义大师布龙达尔对新语法学派作过以下评论:实证主义努力确定规律,新语法学派几乎把确立的规律看作整个科学中最高和唯一的合法目的,并且认为这些规律对于严格研究词源学和谱系学具有重要意义(布龙达尔 1992: 153)。

世纪之交,各个自然学科研究范式的变化为语言学研究的转向提供了外部语境。20世纪的“物质结构”理论贯穿于各个自然学科,比如机械运动形式方面的力学结构研究,物理学方面的原子、基本粒子结构研究,生物学方面的生物体结构研究,化学方面的分子结构研究等。当时,物理学的发展是惊人的。1897年,英国物理学家汤姆逊发现了电子。1900年,德国物理学家普朗克提出量子论,后来发展成量子力学。1905年,爱因斯坦提出狭义相对论。爱因斯坦根据惯性参照系的相对性和光速的不变性改造了经典物理学中的时间、空间和运动等基本概念。相对论思想在索绪尔的语言系统论中有所影射。譬如,索绪尔说,“语言是一个系统,它的各项要素都有连带关系,而且每项要素的价值都只是因为有其他各项要素同时存在的结果”(索绪尔 1985: 160)。随着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发展,机械论地位大大降低。

将语言等同于有机体并对其进行机械研究遇到一股逆流。19世纪后半叶,缘于对机械论语言学家集中关注语言个别要素的不满而产生的描写主义运动重视语言要素之间的关系,索绪尔便是典型代表。当时的语言描写深受前达尔文生物学的影响。影响描写主义的生物学原则就是比较解剖学和古生物学的奠基人居维叶(Cuvier)提出的“器官相关法则”。该法则认为,动物的身体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各部位结构之间都有相应的联系。他意识到只有通过研究结构和功能的关系,才能真正地了解结构。居维叶的结构思想在语言学方面的指引作用,不容忽视。“我们可以把居维叶每个生物学术语换成语言学术语。在这种情况下,在我们的眼前就有了近代语言学的结构主义纲领了”(卡西勒尔 1992: 169)。卡西勒尔的评论并非夸张。我们只须将“器官相关法则”中的相关术语略作更改,便能得出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要旨:语言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语言各要素之间都有相应的联系。如同居维叶生物学通过描写喙、腿、翅膀和尾部的关系来解释雀鸟喙的形式一样,库尔特内(Courtenay)和保罗(Paul)等语言学家通过描写不同语音之间的关系来解释某个语音。索绪尔更进一步,将语言学划分为历时语言学和共时语言学,并且强调以研究语言要素关系为己任的共时语言学的重要性。雅柯布森曾经总结道,现代结构主义语言学(音位学)的发展受到相对主义原则的巨大推动。相对主义原则体现在20世纪初的各个领域,包括现代物理学或立体派的绘画理论与实践。在这些领域,主要观念不是关

照物质本身,而是关照相互关系。(Kucera 1983: 874)自然科学中研究范式的转向反映了学科内部发展的要求。这一转向对语言学研究提供了外部参照语境。

## 2 格式塔思想的诞生

从自然科学研究范式的转向中可以看出,结构主义一开始就具有跨学科的性质。语言学家不仅从自然科学研究中获得灵感,而且从当时发展日渐成熟的社会学科——心理学的研究中获得启示。语言学家斯坦达尔(Steinthal)反对以施莱歇尔为首的自然主义语言观,发展了把语言看作个人活动和民族心理反映的学说。斯坦达尔的心理主义语言学体系依据的是赫尔巴特的联想心理学。赫尔巴特把人类的一切认知活动归结为受同化、联想和统觉法则制约的运动。斯坦达尔认为,“语言学不仅在研究个人言语时应依据个人心理,而且在研究民族语言时还应当研究民族心理”(柯杜霍夫 1987: 55)。斯坦达尔心理主义语言观本质上是个人主义的。斯坦达尔和下面提到的冯特一样,在语言学中建立“集体心理学”概念的尝试只是搬弄主观心理学范畴来偷换社会学范畴(汤姆逊 1960: 136)。斯坦达尔的思想影响了保罗·波铁布尼亚、索绪尔、库尔特内等许多语言学家。保罗·波铁布尼亚认为,语言与个人、民族的关系可用心理加以解释,民族语言是一种文化历史现象;索绪尔和库尔特内强调言语活动的社会性质(柯杜霍夫 1987: 55)。

新语法学派在反对以施莱歇尔为首的自然主义语言观时强调人的因素,与斯坦达尔站在一起。该学派认为,“语言不是处于人之外和人之上或自我存在的事物,实际上它只存在于个体的人之中”(柯杜霍夫 1987: 66),是“个体语言活动”(屠友祥 2005: 33)。新语法学派的历史主义显然掺杂了斯坦达尔的个人心理主义观念。“语言的历史主义观念,就是以设想语言为个体不断发展变化的心理生理活动为基础。”(汤姆逊 1960: 136)冯特也重视个体心理。冯特创造的内容心理学是研究个体意识过程的个体心理学,对实验室中个体的心理或心理生理机制感兴趣,忽视社会心理方面,注重研究心理内容。冯特认为,“心理学应该借鉴自然科学的实验方法但又有自己的特殊性,因为个人的直接经验只能为自己所察觉,只有通过个人对自己心理活动的自我观察才能接近直接经验……”(莫雷 2002: 4)。新语法学派的实证主义和同时期冯特内容心理学的元素主义一

致。冯特和斯坦达尔都部分继承了赫尔巴特的联想心理学思想。冯特将心理分析到不能再分的心理元素,认为人的心理是通过联觉或统觉把这些心理元素综合为人的直接经验的。冯特晚年还发展了民族心理学。和斯坦达尔一样,冯特也认为语言是一种“民族心理学”或“种族心理学”的事实。但是,冯特的民族心理学是由无数个体心灵组成的,一切语言事实都用个体心理学解释(沃洛希诺夫 2001: 36)。当时,心理学对语言学的影响是明显的。索绪尔是语言社会心理学派的创始人。(屠友祥 2007: 97-99)库尔特内是心理主义者,认为音位是语音形象,音响形象“是某一音素在任何环境中出现时在人的心中形成的观念”(岑麒祥 1989: 104)。只是到了布拉格学派成立之时,心理学对语言学的影响方才减弱。

如同历史语言学必然受到结构主义思想的挑战一样,世纪之初,冯特内容心理学也受到同样源于德国的格式塔心理学派的发难。韦特海默的似动现象实验是格式塔心理学派的开端和标志。1912年,韦特海默根据似动实验研究结果发表的《视见运动的实验研究》一文初步提出了格式塔基本思想。“格式塔”一词含有形状、结构、整体等意思。在韦特海默看来,似动自身是一种现象,是一个整体,不是若干不动的感觉要素的集合。他进一步得出结论:心理现象的整体是不能分析为元素的,因为整体不等于部分之和,它是先于部分而又决定各个部分的(莫雷 2002: 164)。我们有理由相信,当语言学家放弃自然主义语言观向心理学寻求解释时,必然会注意到世纪之初心理学研究范式的转变。格式塔的思想已经超越了心理学本身。布拉格学派的代表人物特鲁别茨柯依(Trubetzkoy)在讨论音位时就说过,“每一词是一声音整体,一种格式塔,并可使听者将其作为格式塔接受,正如人们在大街上是按其格式塔来识认熟人的一样”(李幼蒸 1999: 159)。雅柯布森早在1929年就指出结构主义的跨学科性:“如果我们想从形形色色的表现形式中概括当今科学的主导思想,‘结构主义’是再恰当不过的名称了。任何一组现象,当今的科学都不是将之当作机械的累积而是视作一个整体来研究。科学的根本任务就是揭示这个系统的内在法则,不管是研究它的静态还是动态”(Jakobson 1971: 711)。

## 3 历史语言学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承接

在语言学研究内部,历史语言学一统天下的局面逐渐打破。19世纪后半叶,历史语言学研究

几乎达到顶峰。随着历史语言学研究的深入,语言学家认识到,即使历史研究也不能仅限于用对单个要素的机械描述来重建原始印欧语。新语法学派的一些人物有时也指出语言是符号系统(结构)。西弗斯(Sievers)曾强调将语言作为系统来调查,他对语音的看法接近现代音位概念。他认为,语言学家应该准确地把握每个音位系统的结构,切记这种结构的决定因素不是在系统中偶然地组合在一起的一定数目的语音,而是各个语音之间的关系(Sievers 1967: 262)。尽管保罗坚持认为,只有历史语言学才是科学的语言学,但是他也看到仅靠历史的方法并不能解决语言的所有问题,历史的研究始终需要系统的研究作补充(卡西尔 1985: 162)。不过,从总体上看,新语法学派研究的仍然是孤立的事实,单一的历史方法妨碍了对语言系统重要性的认识。索绪尔在历史语言学名作《论印欧系语言的原始元音系统》中就已经摒弃了以往机械的历史比较法,把原始印欧语的语音系统看成一个有规则的整体结构,从语言结构的不规则处着手,构拟原始印欧语的元音系统。该文已经显露出索绪尔从系统整体把握语言的结构主义思想。但是与西弗斯、保罗等新语法学派的语言学家不同的是,索绪尔公开强调共时(静态)语言学与历史语言学一样,都是科学的语言学,在历史语言学盛行的时期,突出共时语言学的重要性,并且详细地论述它的原则。

批评新语法学派狭隘的历史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原子论,主张对语言进行共时、静态描写的研究在语言学界已经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现象。除索绪尔之外,主张对语言静态描写的语言学家还有库尔特内、诺伦(Noreen)和马萨瑞克(Masaryk)等。喀山学派的代表库尔特内曾批评新语法学派机械地解释语音变化,认为他们所谓的语音规律只是五花八门相互矛盾的因素的产物,从而强调语音变化的多重因素(戚雨村 1997: 26-27, 康德拉绍夫 1985: 123)。库尔特内与索绪尔有过交往,他们的思想有相近之处。譬如,库尔特内区分语言的静态和动态,与索绪尔的共时和历时相当。同索绪尔一样,库尔特内把语言看作彼此联系和相互制约的组成的系统。库尔特内的弟子克鲁舍夫斯基早在索绪尔之前就认为语言是一个协调一致的整体,这个体系既可以在共存(静态)之中也可以在连贯的序列(动态)之中分析(康德拉绍夫 1985: 126)。不过,索绪尔仅限于说明系统的原则,没有致力于音位系统的实际描写。库尔特内虽区分语音和音位,但是没有完全领悟这种区别

的重要性。(莱普斯基 1986: 63)布拉格学派的成立更是对新语法学派的反动,将结构主义音位学推向高潮。特鲁别茨柯依和雅柯布森等批评新语法学派只研究孤立的语音,认为历时的研究也离不开系统。在特鲁别茨柯依看来,语言由一种状态过渡到另一种状态不是通过一些独立的变化来实现,因为音位系统不是一些独立音位的机械总和,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岑麒祥 1989: 132-133)。雅柯布森意识到语言历史研究不能“仅限于研究孤立的变化,必须根据经历这些变化的系统去考虑它们”(Boas 1911: V D)。

#### 4 布拉格学派的结构主义思想

布拉格语言学的中心特征就是结构(系统)和功能。就结构思想而言,布拉格学派第一次系统地阐发了结构主义理论,尤其表现在结构主义音位学研究方面。布拉格学派的渊源很复杂。大体上看,对布拉格学派的结构主义思想贡献较大的是索绪尔及其学派、库尔特内的喀山学派和布拉格学派的核心成员。索绪尔的影响主要通过两个途径:一是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的出版;二是索绪尔弟子在其逝世后成立的日内瓦学派和巴黎学派对大师思想的积极传播。日内瓦学派的部分学者于1928年参与起草了结构主义章程。巴黎学派的代表人物梅耶(Meillet)参与了第一届语言学家国际会议,并发挥了积极作用。日内瓦学派的卡尔采夫斯基(Karcevskij)参加了布拉格学派成立大会和第一届语言学家国际会议,促进了两个学派之间思想的直接对话。卡尔采夫斯基1917-1919年间在莫斯科讲授索绪尔语言学。通过他,包括雅柯布森在内的斯拉夫语言学家了解了索绪尔的思想。库尔特内喀山学派的影响主要通过布拉格学派的雅柯布森和特鲁别茨柯依实现。雅柯布森曾说,特鲁别茨柯依是通过他接受索绪尔、库尔特内或谢尔巴的影响的(李幼蒸 1999: 159)。库尔特内的主要贡献反映在音位学方面,而且为特鲁别茨柯依和雅柯布森继承和发展。

当然,提到布拉格学派的成立不能不提到捷克本土。这不仅因为它是该学派的始发地,而且因为捷克语言学家,尤其是该学派的发起人马泰休斯的贡献。马泰休斯批评心理主义、新语法学派的历史主义、原子论以及对语音变化规律的偏信。在索绪尔共时语言学讲座的1911年,马泰休斯发表了《论语言现象的潜在性》的报告,明确指出必须对现代语言作共时性研究。马泰休斯接受

索绪尔关于语言系统和结构的思想,但是主张用功能的观点分析语言结构。他的“关于‘发音方法的各种变化,看来,造成了比较微小的语音变化’的这个意见直接推导出后来的音位学说”(康德拉绍夫 1985:147)。

布拉格学派的结构主义思想主要体现在1929年的《论纲》和该学派代表人物的音位学论述中,主要包括:(1)接受索绪尔“语言”和“言语”、“能指”和“所指”的划分;明确区分语音学(研究“言语”的“能指”)和音位学(研究“语言”的“能指”),并确立两者之间的关系;(2)区分语言的共时态和历时态,但不割裂两者的联系,同时强调共时研究的优先地位;(3)不论在共时态还是在历时态中,语言始终是一个系统,“系统”和“结构”的概念同时用于共时和历时语言学;(4)音位定义从心理学转向功能视角,音位结构成分之间的关系通过区别性特征确立,音位由一组区别性特征构成。

## 5 结束语

本文主要论述了欧洲结构主义语言学思想从萌芽到布拉格学派正式确立结构主义原则和方法体系这段复杂的历史过程。从20世纪初的科学语境来说,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产生受到诸学科研究范式转向的影响。从学科内部来看,结构主义语言学又在历史比较语言学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布拉格学派的结构主义思想是不同学派和不同语言学家思想的系统、集中体现。尽管布拉格学派语言学家的思想不免有冲突,但是在结构主义的根本原则上基本达成了共识,并在音位学方面取得了杰出成就。布拉格学派的成立为不同学派思想的融合和借鉴搭建了平台。

结构主义是20世纪以来语言学奉献给语言哲学为数不多的重大贡献之一。虽然须要超越或者说“走出索绪尔的阴影”(季国清 1998:49),但不可否认,它既是语言学学说,又是语言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 参考文献

- 布龙达尔. 结构语言学 [A]. 国外语言学论文选译 [C]. 北京: 语文出版社, 1992
- 岑麒祥. 普通语言学人物志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

- 恩斯特·卡西尔. 人论 [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5
- 恩斯特·卡西勒. 近代语言学中的结构主义 [A]. 国外语言学论文选译 [C]. 北京: 语文出版社, 1992
- 季国清. 语言的本质在“遥远的目光”中证明: 语言哲学的新视野 [J]. 外语学刊, 1998(3).
- 康德拉绍夫. 语言学说史 [M]. 武昌: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85
- 柯杜霍夫. 普通语言学 [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87
- 孔 德. 实证哲学教程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3
- 李幼蒸. 理论符号学导论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
- 莫 雷. 20世纪心理学名家名著 [M]. 广州: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2
- 戚雨村. 现代语言学的特点和发展趋势 [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7
- 乔利奥 C. 莱普斯基. 结构语言学通论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6
- 索绪尔. 普通语言学教程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5
- 屠友祥. 索绪尔与保罗 [J]. 外语学刊, 2005(1).
- 屠友祥. 索绪尔与喀山学派: 音位的符号学价值 [J]. 外语学刊, 2007(3).
- 威廉·汤姆逊. 十九世纪末以前的语言学史 [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60
- 沃洛希诺夫. 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 [A]. 语言与翻译的政治 [C].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1
- 兹维金采夫. 普通语言学纲要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1
- Boas F. *Handbook of American Indian Languages* [M].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11.
- Jakobson R. *Selected Writings* [M]. The Hague & Paris: Mouton, 1971.
- Kucera H. Roman Jakobson [J]. *Language* 1983 (4).
- Robins R. H. *A Short History of Linguistics*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1.
- Sampson G. *Schools of Linguistics* [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 Sievers E. Foundations of Phonetics [A]. W. P. Lehmann (ed.), *A Reader in Nineteenth Century Historical Indo-European Linguistics* [C].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67.